

江南文化形成发展中的日本因素

——以上海为例——

郭洁敏

“江南”是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概念。然而，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

上海是江南的杰出代表，亦是江南文化的承上启下者。近代以来，它在欧美等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多元整合，推陈出新，在传统江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海派文化”。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江南文化对日本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与此同时来自“东洋”的日本文化也对江南文化的发展，尤其在近代上海，对江南文化向“海派文化”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一、历史轨迹：“十里洋场”中的“东洋风”

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以英美为代表的外来文化长驱直入，对本土江南文化构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例如，以租界为中心的西洋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给上海带来了西方现代文明，推动了上海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型。昔日的上海滩演变为“十里洋场”，成为灯红酒绿、时尚娱乐的“东方巴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国”，大量日本人携带着他们的日本文化“因子”漂洋过海来到上海，使“西洋化”的“十里洋场”吹进了一阵阵“东洋风”。

从历史来看，由于一衣带水，江南地区同日本一直有着密切的往来。据史料记载，秦汉以后江南同日本、朝鲜、台湾、南洋等地贸易沟通频繁，形成了“水上丝绸之路”。19世纪60年代，日本开国后使清第一船“千岁丸”来到上海，被“锁国”200多年的日本人重新出现在黄浦江畔，唤起了上海人对他们的好奇和悠久的历史记忆。19世纪末以后，日本各个阶层的来沪人员日渐趋多，他们或是官方派遣，或是民间自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在上海虹口一带逐渐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日本人来到上海后相继开设了商行、酒楼、戏院，以及“东洋馆”、“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等教育机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诸国相继以新兴的近代日用消费品倾销中国，牟取暴利。对此，日本也不甘落后。由于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并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所以具有天时地利的有利条件，在对华贸易中与英法等国竞争屡屡获胜。日本人的商品以价廉物美吸引中国商家和消费者，一直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尤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各国忙于打仗，相继减少或中断了对华贸易，于是日本人抓住机会，填补空缺，提升了其上海乃至江南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中国近代很长的历史时期，“西洋”一词指欧美等国，上海词汇中的“东洋”则专指日本，“东洋人”即日本人。这一方面因为日本是“东瀛”国家，具有地理位置的含义，另一方面显然将日本同欧美相提并论，认为其同属“洋”的层次。一时间，上海人将来自日本

的事物均冠于“东洋”名称，诸如东洋茶楼、东洋车、东洋戏等不胜枚举。后来，在上海开设的日本商店也以“东洋店”、“东洋号”、“东洋庄”自称。1982年以来，从日本长崎市新地镇几间仓库的废墟里，发现了在日华侨商社泰益号及其前身等的半个世纪(1880—1945年)的庞大的商务资料群，引起东亚华侨界、华侨史研究者以及日本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的广泛关注。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日本人数量已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侨民。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更有大批日本人蜂拥而来，使得上海的日侨总数迅速膨胀，于1942年达到高峰，为150931人¹。

人是文化的符号，“文化即人化”。日本人在上海无论从事商业、文化活动，还是衣食住行日常生活，都对上海这个城市乃至江南文化产生了“多元效应”以及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建筑。由于当时“西风东渐”，上海的新兴建筑都有着浓郁的西洋风格，而日本人在虹口一带设立神社、寺庙，并在沿街马路建造民宅，耸立起一些与西洋欧美建筑不同的“东洋”日式建筑，如虹口北四川路千爱里一带花园里弄住宅。其中，位于千爱里3号的内山完造寓所（图一）是幢坐北朝南的新式里弄花园洋房，砖木结构假三层，拉毛水泥墙面颇具日本式建筑风格，整幢建筑显得小巧精致。多伦路85号日式小洋房，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它的建筑形态处理简洁，属于日本“洋风时期”的住宅建筑类型，并有东西方建筑风格融合的特征。这一洋房为复式人字形屋顶，铺盖小青瓦，中国传统的歇山式山墙、平拱木门窗，外墙立面采用现代式装修手法，贴面为拉毛水泥。北立面门廊采用罗马风格建筑，即古罗马式的拱和柱。走入室内，可见向外的门窗大多是推拉式的，木棍方格糊纸，内部隔断



图1 1933年初鲁迅在上海内山完造寓所前与内山完造合影

¹ 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

也是轻质的。日本传统风尚是席地坐卧，所以室内高度大约在2.5米左右，木地板架得比较高。前檐下设平台，很适合做家务。整幢建筑显现出既古朴苍劲，又优雅洒脱之韵味。

又如，澳门小区位于澳门路660弄，是民国九年（1920年）日商外棉财团为职员建造的高级住宅。抗日战争胜利后，它被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二宿舍，现为居民住宅。房屋为



图2 澳门小区日式住宅正面



图3 澳门小区日式住宅俯视图

2层砖木结构，共建有38幢（图二、三）。

总之，在今日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无论是作为城市“硬件”的建筑，还是作为城市“软件”的多元风格，都有着日本文化的重要“遗产”。这已经引起上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的学生在老师支持下，作为理工科项目中极少数的文科项目，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走街串道实地考察，仔细寻访了虹口区的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弄堂，用照片和文字资料把它们记录下来，并用采访的方式将它们在如今老上海居民记忆中的印象拼凑整合，最终完成了《虹口的日本文化图册》，并作为优秀项目参加了2011年第二届上海市大学生创新论坛。

二、文化律动：海派风格多元整合中的沪日交流

近代以来，上海经过“西洋风”、“东洋风”的熏陶和洗礼，在东西文化的大熔炉里“多元组合”、“多重叠加”，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江南文化的海派性格，后来被称之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是本土文化（江南文化）同外来文化的结合，它反映了江南文化的发展变迁。“江南”是从地理角度，“海派”是从品格角度。海纳百川、多元并存是海派文化的特征，当年的上海就是不同文化的汇集地，如外滩的英国文化、霞飞路的法国文化、摩天大楼所代表的美国文化，以及虹口外白渡桥一带的日本文化等，它们各具特色又相互协调地组成了海派文化的多棱侧面。

以往的海派文化研究，较多注意欧美等“西洋文化”的影响因素，而相对忽视日本“东洋文化”对上海多元文化的“介入”。其实，这段时间上海同日本不仅商贸往来密切，文化交流活动也非常活跃，它使得江南文化的“海派性格”更加多元和独特。例如：

一是“典籍回归热”。明末清初中日书籍交流、文化商贸活动日趋频繁。十九世纪后期，由于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社会的动荡和维新以后价值观的变化，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古书以及汉籍和刻本从古寺、旧家中流散而出，其中相当一部分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如杨守敬²从日本带回大量善本旧籍就是其中著名的事例。与此同时，活跃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书商的商业活动也是汉籍回流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比如，岸田吟香³积极扩大印刷和书籍贩卖方面的业务，在向日本输入新出版的中国书籍的同时，也出版一些在日本有销路的加有训点的汉籍。与此同时，他把日本市场上大量廉价的中国古籍、和刻本汉籍及日本人用日文编撰的书籍等运到中国进行贩卖。另一方面，日本人在通过上海做了大量调查的基础上，购买了湖州大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把那儿的珍贵文化典籍尽数取走。同时，中国人在上海也购买了不少日本的珍贵典籍。

二是“书画交流热”。文化商贸和文化活动促进人际交流和文人友谊。2009年2月，复旦

² 杨守敬（1839—1915）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有83种著作传世，名驰中外。杨守敬，字惺吾、号邻苏，晚年自号邻苏老人。

³ 岸田吟香（1833—1905）是日本第一代成功的企业家。他17岁开始学习汉文典籍。清同治五年（1866年）抵上海，结识一批中国画家与书法家，研究中国国情。同治七年，为购买轮船，再次到沪。后为《东京日日新闻》主笔，又在东京开设乐善堂药店，贩卖书籍，兼办广告业务。光绪四年（1878年），第三次到沪，在河南路开设乐善堂药店上海分店。后在沪达30年，经营眼药水，开设印刷厂，用铜板印刷诸子百家袖珍典籍，获利颇巨，结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沪上名人。

大学陈正宏先生在大阪府立图书馆发现19世纪中叶日本画家田结庄邦光当年游历上海等的日记原本，以及一批他在华期间与上海等地士绅笔谈的原稿，据此考证了当时中日两国民间书画交流的实际情况⁴。

论及中日书画交流史，不应忘记王一亭⁵的贡献。他很善于组织策划对日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从1929年第五届中日绘画联合展到1931年中日绘画展在东京上野展出，都由他一手操办。当时日本各界人士参观踊跃，盛况空前，这使得王一亭更加看到中日文化交流的巨大空间，以及中日书画家之间的传统友谊。后来，他和叶恭绰于1930年春组织了“中日艺术同志会”，加强和促进中日两国书画家的交往。参加该会的中国书画家有王一亭、狄楚青、黄宾虹、张大千、潘天寿等56人。翌年元月，王一亭以“中日艺术同志会”的名义在自己的“梓园”宴请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和画家渡边晨畝等，中方有书画家、名人赵叔儒、李平书、杨度陪同，席间共同策划筹备在东京举办“元明清名画展”和“中日现代绘画联展”，并商定在当年樱花盛开的时节，由王一亭率中国书画家访日。

又如，“六三园”是日本名士白石六三郎在上海建造的最大的私人花园，既有汉风唐韵，又有“大和”特征。从1912年至1926年的十多年间，“六三园”实际上成为上海中日书画家艺术交流、作品展示的中心。1914年，王一亭为吴昌硕在“六三园”举办了其生平第一次“个展”。正是这次展览，使吴派艺术为日本艺术界所推崇。1919年3月，中日收藏界在“六三园”联合举办了“沪上私家精品金石书画文物收藏展”；同月，有关各方达成了1922年在日本大阪高岛屋举办“吴昌硕书画篆刻展”的计划。高岛屋为吴昌硕举办画展，不仅证明了吴昌硕的艺术品质和地位，更表明上海海派书画艺术向海外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无疑也是现代中国艺术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浓重一笔。1920年4月，中日美术协会在上海成立，1923年改为会员制，由此拉开了中日书画家大交流的帷幕。自1921年起，中日美术协会成功组织了五次“中日联合美术展览会”，使中日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度。

另外，在文坛上，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的进步书籍大多被国民党查禁，内山书店因受治外法权庇护而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和进步书籍的发行处。鲁迅著作及左翼进步作品都在这里公开出售。内山完造三次协助鲁迅举行木刻展及一次木刻讲习班。1925年11月，内山完造第一本随笔集《活生生的中国》出版，鲁迅先生为其作序，内山称这是“天下最好的馈赠”。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内山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并被聘为《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1938-1944年，内山又撰写了《上海漫画》、《上海夜话》、《上海风行》、《上海霖语》等一系列有关上海的书籍。他是上海近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三、江南与日本：文化交流中的双向影响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15世纪以后的日本

⁴ 陈正宏“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画家田结庄邦光的上海游记以及与沪人笔谈资料”，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江南文化与日本——资料、人际交流的再发掘”国际研讨会》，2011年5月。

⁵ 王一亭（1867-1938）名震，号白龙山人、觉器，浙江吴兴人，画家。早年曾任商务买办，入同盟会，资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为上海商界名人。诗画方面的著作传世者甚多。早年学画得徐小仓指点，后与任颐、吴昌硕友善。能画人物、花鸟、走兽、山水、尤擅佛像。

文学作品中，如能和狂言，就开始经常出现来到日本的中国人和前往中国的日本人的形象。诸如江南稻作文化对日本历史文化的重要影响等，已成为中日广大学者的共识。具体而言，如认为日本的稻作文化来源于中国长江下游即吴越地区，其他如桑蚕文化、江南文化中以“吴门医派”为代表的医药文化，对日本农业和养殖业，以及汉医药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等。许多中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梅原郁、夏日新的“江南文明对日本的影响”⁶，都对江南文化如何影响日本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

不可否认，对于“江南文化与日本”这个话题，无论中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都比较多地关注江南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而反过来有关日本文化如何影响江南文化的著述则似乎不大看得到。这可能因为中国曾经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基于中心-边缘模式的原理，人们一般总是认为由“中心”向“边缘”进行文化扩散和传播的。当然，这也是客观事实。历史上日本曾经以中国为“师”，从文字、律令、到儒教文化，大量吸收中华文明（包括江南文化）的有用部分。较为著名的文化传播有鉴真和尚、遣唐使等。后者先后大批坐船来到中国，经过长期在中国（包括江南）的学习体验，将许多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中国文化带回日本。然而，人际交流和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并非总是单向的，尽管各方传播和接受的程度强弱不均，不是处于对等的关系。然而，事实上弱势文化同样会对强势文化发生影响。也就是说，在中华文明（包括江南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日本文化实际上也在对中国文化（包括江南文化）产生影响。何况，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化开始逐渐由弱势转向强势。

所以，近代以来上海在江南文化基础上向“海派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忽视日本文化的因素是有失偏颇的。

第一、如前所述，日本人在上海的各种商贸和文化活动，包括“硬件”方面的建筑，“软件”方面的人文精神、生活方式等已同欧美文化一起，构成上海“海派文化”多元内容之一。而且，具有独特性的是，有些日本人在上海留下的“文化痕迹”，呈现出原由中国输出到日本，经过他们的再发展，又经由江南传回中国的路线图。这不仅表明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紧密关系，也反映了异质文化之间接受融合与再创造过程。

例如，1870年前后，宁静的南苏州路、圆明园路交界处，即英国领事馆后面，有一家经营“有田烧”的日本陶瓷店。这家“有田烧”的店名叫“田代屋”，是上海最早的日本商店，由来自长崎的田代源平创办。“田代屋”是长崎经营“有田烧”的著名店铺。日本最初的陶瓷是中国传入的，奈良时代模仿中国唐三彩制造了后被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1616年，来自朝鲜的李参平在长崎一个名叫“有田町”的地方成功地烧制了新一代陶瓷，开创了日本制作陶瓷的时代。此时，“有田烧”陶瓷带着日本的文化韵味又传回到上海。

又如，“漫画”一词首创于中国的南宋，而后传到日本。其后，它销声匿迹，在近代被日本人重新使用后再传到中国。丰子恺1941年在“漫画”一文中指出：“‘漫画’这两个字最初是日本用出来的。后来舶来中国，到今日已经盛行⁷”。

第二、中国人在日本进行贸易、学习和文化交流之后带回了日本文化。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江南学子大批奔赴日本留学，而后返回国内从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把日本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带回上海、江南乃至全国。社会科学方面亦

⁶ 梅原郁、夏日新“江南文明对日本的影响”《江南论坛》2011年第5期。

⁷ 丰华瞻、戚志蓉编《丰子恺论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

是如此，今日很多社会科学词汇，都是从日本传来的。如“革命”、“干部”、“资本主义”……。

在艺术界，“海派”的上海是中国和世界沟通的一个窗口。如话剧和漫画等，都是上海相对发展，而后扩大到其他地方。产生于19世纪末的中国话剧不仅有着西方文化的印记，而且受到了日本近代戏剧的影响。独树一帜的丰子恺漫画则直接体现了对日本画家竹久梦二“感想漫画”的接收和融合，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简洁传神的艺术风格。

另外，岸田吟香等在上海引进以印刷技术为代表的日本先进技术，如用铜板印刷诸子百家袖珍典籍打开销路，这在形成“海派”精致唯美、注重市场的商业文化方面，也是有着积极推进作用的。

“海派文化”的特点是兼容并蓄、多元并存。它不断从外来文化中汲取养分，无论“西洋”还是“东洋”，同时不断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融会贯通和变革创新。它所具有的海纳百川的胸怀和自我调节的功能，使之形成了丰富多彩、雅俗共赏的人文精神和城市品格，并且总是能够与时代潮流同步、与国际时尚接轨。

江南文化是包括上海在内的区域文化，但由于上海独特的历史发展条件和机遇，已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同江南文化并非若即若离的关系，它意味着和代表着江南文化发展的新阶段。现在，海派文化正以上海为中心，影响或辐射到整个江南地区，即长江三角洲地区。

研究江南文化，不可忽视它的“海派”发展方向，亦不可忽视江南文化形成发展中的日本因素。从江南文化发展到海派文化，日本文化同欧美文化等一起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因时空的浓缩而越来越日常化，同时也越来越具有即时和互动的特点。在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文化冲突并非主流，文化的多元并存是总体方向。江南文化向海派文化的发展演进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

参考文献：

- 王勇主编《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
 翁其银“日本长崎发现的与上海东洋庄有关的资料群剖析”《学术季刊》2000年第3期。
 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
 凤媛《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9月。
 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4月。
 梅原郁、夏日新“江南文明对日本的影响”《江南论坛》2011年第5期。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江南文化与日本——资料、人际交流的再发掘”国际研讨会2011年5月。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著《上海名建筑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